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日内瓦

## 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 概 述



联合国  
纽约和日内瓦, 2002 年

## 说 明

-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 

- 本出版物所采用的名称及其材料的编写方式，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秘书处对于任何国家、领土、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地位，或对于其边界或界线的划分，表示任何意见。
- 

- 本出版物的材料可自由援引或翻印，但需说明出处及文件号码。应向贸发会议秘书处提交一份载有文件引文或翻译部分的出版物。
- 

- 此处所载的概述也作为 2002 年贸易和发展报告 (UNCTAD/TDR/(2002), 出售品编号 E.02.II.D.2) 的部分内容印发。

UNCTAD/TDR/(2002) (Overview)

## 概 述

在探索方法以求应对当今最为紧迫的政策挑战时，有些人以为，现在需要求教于前人，随即想到的就是：制定一项马歇尔计划——只不过这次的目标是对全球贫困开战，实行一种托宾税以遏制金融动荡，推行一整套凯恩斯消费政策来抵御通货紧缩的危险。这种思潮的出现，是艰难岁月的征候。艰难的根源，在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的辞藻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即使政府对于自由贸易的种种好处赞不绝口，但是，当国内选民感受到国际竞争寒风的威胁时，它们便总是乐此不疲地动手干预，加以保护。这种新重商主义思维的残余，对于乌拉圭回合达成的谈判结果起了不小的倾覆作用。

自从在西雅图举行了第三次世贸组织部长级会议以来，为解决发展中国家的关注再度做了努力，最后在多哈达成了另外一种不同的谈判结果。发展中国家同意了一套综合性的工作和谈判计划，从而表明了自己对于应付各种全球性政治和经济威胁的承诺；而作为回报，它们期待着谈判能把发展关注放在中心位置。现在的挑战是，要把经过扩展的谈判议程转化为真正的发展议程。

在谋求较为均衡的贸易体系时，我们听到了来自过去的声音。1964年3月举行第一届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时，时任贸发会议秘书长劳尔·普雷比什在发言中呼吁工业化国家不要低估发展中国家在当时体系中面临的基本挑战：

我们认为，决不能迫使发展中国家内向发展，而如果不通过适当的国际政策帮助它们走上外向发展的道路，就会出现这种局面。我们还认为，无论是因为缺少适足的外部资金，或是因为此种资金由于不良的贸易条件受到损失，为了提高资本总量而接受那些趋于降低大规模消费水平的建议是不可取的。

普雷比什懂得，主张在不平等的贸易伙伴之间“自由发挥市场力量”只会使较贫困的初级商品出口国受到惩罚，同时为富有的工业化集团带来好处。他用以纠正顽固的贸易不平衡和创造基本外部条件以求加快增长速度的议程，包括了发展中国家参与贸易体系的新模式，这类模式将为初级商品出口保障价格稳定和改善市场准入，为发展本地工业留有更大的政策空间和减少其出口面临的障碍，建立较为适当的多边体系准入条件并减少债务还本付息的负担。尽管自那时以来发展中国家对贸易体系的参与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普雷比什提出的这个最起码的议程，仍然是为了支持发展而恢复贸易体系平衡的基础。

## 全球趋势和前景

世界经济的增长在 2001 年骤然减速，发达世界的所有三个主要经济区域全部业绩疲软，发展中国家受到的连带影响远远大于 1990 年代历次滑坡造成的冲击。东亚和拉丁美洲的若干新兴市场经济体进入了衰退。只有中国和印度这两个规模庞大和相对封闭的经济体基本上免受了世界市场的向下压力。非洲的增长率保持在与上一年度相似的水平。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的增长率，从上一年度的 5.4% 下降到仅有 2.1%。

美国经济进入了衰退，而以为欧元地区不会受到影响的想法，证明是没有道理的。出口的衰落、驻美分支企业利润的降低以及谨小慎微的货币和财政对策加在一起，使欧元地区 2001 年的增长率下降到了 1.5% 左右。连续下降了三年的失业率在相对较高的 8.5% 水平上定住。在大型的欧盟经济体中，只有联合王国由于消费需求强劲而情形较好。始于 1999 年的日本复苏在接下来一年的后半年里化为乌有，自 2001 年第二季度起经济更是陷入衰退，出口和私人投资以两位数的速率下滑。虽然日本中央银行在 2001 年 3 月重新执行零利率政策，但许多公司出现了前所未有的亏损，企业破产不断增多，失业率攀升到 5.5%。

在工业化世界的经济减速向发展中国家传播的过程中，国际贸易起了重要作用。发展中国家的出口量在 2000 年增长了 14% 之后，在 2001 年才增长了不到 1%。所有主要的发展中区域都受到了影响，但最突出的是东亚和南亚。这两个地区 2000 年的出口增速突出，很大程度上是由于美国当时对于电子产品和半导体的需求强劲。估计中国台湾省的出口降幅超过 15%，大韩民国为 10%，香港(中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和泰国为 5%。在有些区域，出口量增长放慢的同时还遇到了价格下跌，这在拉丁美洲尤为

明显，商品出口价格出现了大幅度下滑。石油价格从 2000 年后期的峰值水平急剧跌落也减少了石油出口国的收入。与此不同的是，非洲国家出口的某些商品在 2001 年维持了良好的价格地位。

2001 年进入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流量仍然处在 1997 年亚洲金融危机以来始终走低的水平上，在 9 月 11 日以后更是严重受挫。人们一度曾经指望美国经济减速和放松货币政策会出于同 1990 年代初相似的原因而推动资本流入新兴市场。然而，由于加大了在工业化国家经济下滑面前的脆弱，一系列金融危机之后围绕这些市场持续不退的不确定性已经变得更为复杂。因为与 1990 年代初的情形不同，发展中国家的增长今天已经与美国的增长更为密切地直接挂钩，对于追求更高的按风险度调整的回报率的投资者来说，这些国家提供的多样化余地减少了。东亚借款人向外国银行偿还贷款的数额继续大幅度超过其他地方得到的新贷款，证券化债务流入发展中国家的速度继续放慢。外国直接投资(直接外资)的情况较好：流入拉丁美洲的资金使得这一区域成为最大的资本净流入接受区域。但是，直接外资的这种活力似乎不大可能持续进入 2002 年。中国 2001 年的资本流入净值有所增长，看来只有这个国家可能以更大的规模继续吸引资金流入，何况它现在已经加入了世贸组织。

发展中国家的汇率相对稳定。主要的例外是阿根廷和土耳其，这两个国家被迫浮动货币汇率，两者都引发了相当剧烈的金融动荡。在阿根廷，放弃固定汇率与规模大得多的经济危机相连，这场危机对该国本身及其邻国带来的全部后果目前尚不明朗。但是，并没有发生向其他新兴市场的大面积蔓延。自 2001 年初以来，发展中国家有着实行浮动汇率制的进一步动向，而通常官方又愿意实行干预以防汇率大幅摆动。

在 9 月 11 日事件之后，尽管世界上最重要的各个央行协力应对，但只有美国始终一致地将政策侧重于限制经济滑坡对于就业和实际收入的影响。欧元地区的《稳定与增长协定》引导的是追求赤字指标，对于不同国家的周期性地位没有给予充分注意。虽然欧元疲软对于维持国外需求有所帮助，但从全球角度看，欧元地区的货币政策也还是限制性的。在日本，似乎希望被全部寄托在利用疲软的日元启动以出口为先导的复苏之上。但是，复苏还需要扩大消费开支，而这单靠货币政策是不大可能实现的。

因而，事情的关键还是在于美国复苏的力度。到目前为止，尽管失业率上升，实际工资增长放慢，但强于预期水平的消费开支已经限制住了产出的下跌。现在的私人储蓄水平仍然极低，而持续的复苏却将不得不顺应私人家庭恢复正常消费习惯时的局面。同时，企业的资产负债表可能需要进一步整顿，为振兴投资而实行货币扩张政策的潜力似乎是有限的。只有在消费者和商界的信心强大到足以使厂商相信需要为新生产能力增加投资时，才会出现持续复苏。然而，现在没有多少此种征兆。

由此看来，一种可能的结果是，美国经济将在某一低水平的正值增长率上稳定下来。此种结果对于欧洲和日本的推动作用有限，它们仍然依赖于以出口带动好转。另外，如果在欧洲和日本的增长依旧缓慢的同时，美元保持坚挺，美国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逆差就有可能进一步扩大，而美国国内保护主义压力加剧的危险和美元最终大幅贬值的风险，可能就会带来一个货币动荡更为普遍的时期。

多数亚洲经济体由于实行了积极的政策刺激国内需求，在 2001 年最后一个季度恢复了正增长。一些拉丁美洲经济体和一些转型经济体也在该年早些时候设法顶住了全球趋势。然而，工业化世界的增长率不可能迅速恢复到支

持发展中世界的就业和收入有力上升似乎所必需的 3% 水平。达到这项目标的必要条件是，对发展中国家出口品的需求大为提高，初级商品价格有力回弹，资本流量强劲增长。目前看不出什么这样的前景。

受不良外部条件影响最少的将是东亚和南亚的新兴市场，这些市场近期的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一直保持顺差，外汇储备与短期外债量的比率一般都相对较高。与此不同的是，多数拉丁美洲国家将需要更多的资本流入以求为更加有力的增长注入资金。欧洲一些转型经济体的增长率也取决于欧元地区出口市场以及资本流动的活力。

在这样一种全球增长缓慢的情况下，改善市场准入将会为发展中国家的活动提供有益的推动力，更多地利用区域贸易和融资机制可减缓外部制约的压力，提供防范金融动荡的保护。无论如何，如果想保护众多发展中国家免受外部经济环境困难的影响，就将继续需要用大量官方资金予以支持。

## 世界贸易中的发展中国家

从根本上说，多数发展中国家面临的基本政策挑战，仍然是如何以最佳方式将贸易和工业的种种要素力量用于创造财富和满足人的需求。摆脱原先对于出口初级商品的依赖，转而逐步扩大工业品的生产量和出口量，往往被看作是这些国家较为有效地参与国际分工的一种手段。期望制成品能带来更好的出口收入前景，不仅是因为制成品有利于较快速的生产力增长和产量扩张，而且还在于，即使产量不断扩张也仍有希望增强价格稳定，从而避免贸易条件的衰落。贸易条件恶化已经使许多依赖初级商品的经济体在长期增长业绩上饱受挫折。

自 1980 年代初以来，贸易和直接外资的迅速自由化动向有力地影响了许多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对于所面临挑战的思考。人们期望，对国际市场力量和竞争开放能使这些国家改变它们参与国际贸易的速度和格局，从而克服收支平衡问题，加速增长，赶上工业化国家。

在这段时期内，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增长速度确实超过了世界平均水平，现在占了世界商品贸易的近三分之一。在这一增长中，相当大一部分是制成品，目前已达发展中国家出口的 70%。在有些产品当中，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占世界出口量的半数左右或以上。更重要的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看来已经成功地进入了技术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而这类产品属于过去二十年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产品之列，尤其是电子和电器产品。

可是，更仔细的研究之下就可以看出，情形比这要微妙得多。除了工业基础雄厚、已经密切融入全球贸易体系的少数东亚第一批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之外，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仍然集中在主要通过开发自然资源、使用非熟练劳动而来的产品上，这类产品的生产率增长前景有限，在世界市场上缺乏

动态活力。显示发展中国家技术密集型、有供应活力的高增值产品出口大为扩张的统计数字是一种误导。此种产品只是表面上由发展中国家出口，但实际上这些国家从事的往往是跨国公司组织的国际生产链条中低技能的组装环节。大部分技术和技能包含在进口的零部件中，而生产这些零部件的较先进国家厂商和组织此种生产网络的跨国公司拿走了增加值的很大一部分。

虽然发展中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包括高速增长的高技术产品的出口中占有的份额迅速扩大，但这些国家从此类活动中获得的收入看来确实与这一动态并不相称。在这一点上，对过去二十年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情形加以比较首先就会使人感到有些担忧。尽管发达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出口中的份额现在有所下降，但它们在这段时期内实际上提高了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发展中国家却与此相反，虽然制成品出口与国内生产总值(内产总值)的比率直线上升，但制成品增加值与内产总值之比却没有出现大幅攀升的趋势。就此而论，发展中国家在增加世界制成品出口份额的同时，并没有相应提高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而且，有些国家的这两项比率出现了朝相反方向发展的趋势。在过去二十年里迅速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和制成品出口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国家中，大幅度提高了在世界制成品收入中的份额的国家实在寥寥无几。

显然，对于许多发展中国家来说，尽可能多地获益于国际贸易体系已经不再是摆脱初级商品出口这样一个单纯的问题。同时，需要结合与发展中国家增强参与国际贸易体系相连的各种近期趋势，重新研究对初级部门的价格和生产率动态产生过不良影响的种种力量，包括市场的竞争结构、收入弹性和技术薄弱环节。

## 世界贸易中的活跃产品

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世界商品出口值每年平均增长大约 8%，而全球产出和收入的增长不足 6%(以现值美元计)。在此份《贸易和发展报告》研究的 225 项产品中，有些产品的出口增长速度是全球收入增长速度的三倍，而另一些产品的出口值出现了绝对下降。增长率止步不前或出现负值的主要是初级商品，但也包括一些制成品。在包括初级商品和制成品的全部产品中，有三分之一的贸易增长率落后于全球收入增长率。

虽然世界贸易中增长最快的产品一般都是制成品，但这一组别中也有一些农产品，如非酒精饮料和谷物。世界贸易中许多增长最快的制成品，如占现在世界出口总量大约六分之一的电子和电器产品，趋向于技术密集型，研究与发展(研发)含量往往很高。这类市场动态型制成品的一个共同特点是，生产此类产品的部门表现出有力的生产率增长。而其他一些市场动态型产品，如技能含量属于低或中等程度的纺织品和服装以及运输设备，生产率的增长就相对较弱。

有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比另一些产品有更强的活力，原因可能在于收入弹性、产品创新及消费格局变化上的差异和产业竞争力在不同国家发生的改变。但是，市场自由化速度上的差异也起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尤为重要的一种影响，是许多发达国家限制其市场准入的商业政策。与其他部门的自由化速度相比，纺织品和服装以及其他一些劳力密集型制成品的贸易自由化受到了限制，速度缓慢。除了高额关税和关税升级之外，雪上加霜的还有其他一些公开形式的保护，如关税配额，以及反倾销行动和产品标准造成的负面影响。非关税壁垒，尤其是针对简单制成品的此种壁垒不断增多，巩固了对高技术产品有利，对趋于

在工业化早期阶段占有重要地位的中低档产品不利的市场准入风行格局。

跨国公司的战略或许对于产品活力具有更强的决定性影响。过去二十年增长率最快的三个产品组是，电子和电器商品的零部件、服装等劳力密集型产品以及高研发含量商品，是受通过国际生产分工安排实现的生产过程全球化影响最深的产品组。资本流动性的增强加上劳动力流动继续受到限制，扩展了国际生产网络的延伸，在生产链能够分割并定点于不同国家的一些部门加快了贸易增长速度。往往通过区域安排达成的优惠关税规定和财政及其他鼓励措施推动了这一进程，促成了一种新的贸易格局。在这种格局下，商品送到最终消费者手中之前分别在若干不同地点加工，而此种产品实现的全部贸易价值大幅超过其增加值。以此种网络之内的专门化为基础的贸易量，估计高达世界出口的 30% 以上。

## 贸易与产业：新的关联，旧的挑战

在过去二十年中，发展中国家作为一个整体似乎更为积极和活跃地参与了世界贸易，但是，透过更为仔细的观察可以看出，它们参与国际分工的方式是形态各异的：

- 首先，许多国家未能从市场相对停滞或衰落的初级商品脱身。不过，有若干初级商品的贸易增长与一些制成品同样迅速，成功跻身于此类部门的国家大为提高了出口和收入；
- 第二，实现了从初级产品向制成品转变的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的办法都是侧重于以资源为基础的劳力密集型产品，而在世界市场上这类产品一般都缺乏活力；
- 第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技能和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快速上升，过去二十年里在世界贸易中实现了迅速扩张。但是，除了某些突出的例外，发展中国家对此类产品的参与局限于增加值甚低的劳力密集型组装工序。结果，其中有些国家在世界制成品收入中的份额实际上有所下降。而另一些国家制成品增加值的上升幅度远远落后于它们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取得的份额；
- 最后，有少数国家在世界制成品增加值中的份额急剧上升，达到或超过了在世界制成品贸易中的份额的增长幅度。这一组别中包括一些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它们在发展中世界近期向以出口为驱动的模式转变之前就已经实现了工业化的长足进步。过去二十年中快速实行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国家，没有一个属于这一组别。

由此看来，多数发展中国家出口的仍然是资源和劳力密集型产品，实际上依靠提供廉价、低技能的劳动力参与

竞争。除了最后一组之外，它们似乎未能在出口和收入增长之间建立起使它们能够迅速填补与工业化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的动态关联。虽然从整体看上去它们在多种活跃产品的世界市场上成为了重要的角色，但就在研发含量、技术复杂程度和(或)规模经济上占据高位的产品而言，它们仅占世界出口的 10%。

要想弄清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其中大力扩展对外贸易，但却不能通过相应提高收入得到回报的一种体系，就需要做一番艰苦的思考。第一步是摒弃漫不经心的经验论，不要仅从表面价值看待贸易中制成品的划类。一般而言，参与高技术生产部门的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从事整个生产过程中技能和技术密集型的部分。因此，它们对于增加值的贡献取决于非熟练劳动这一最不稀缺和最薄弱要素的成本，而诸如资本、管理和专门知识等稀缺但有国际流动性的要素换来的回报，则被这些要素的外国所有者收获而去。所以，这些发展中国家出口的是劳动本身，并不是劳动的产品。实际上，即使像中国和马来西亚这样的国家，虽然通过参与国际生产链非常成功地提高了在世界制成品出口和增加值中所占的份额，但国内增加值的很大一部分被直接外资赚取的利润所占取。

显然，参与国际生产网络的劳力密集部分，能够给处在工业化初级阶段并有大量过剩劳动力的国家带来可观的利益。即使由此而来的增加值不高，但能使这些国家增加就业和人均收入。另外，在与国际生产网络相连的活动中增加低技能劳动力的就业，无论这些生产网的组织者是在若干不同地点生产一套标准化产品的大型跨国公司，还是位于不同国家并通过国际分包协议相互连接的较小型企业集团，都确实扩大了有可能开始实行工业化的部门范围，扩大了有可能获得基本的技术方法和组织技能的部门范围，而此种方法和技能是扩大增长基础的先决条件。但

是，这并不等于跨入快速和持续工业增长新格局的一种跃进。

这类国际生产网络使跨国公司对投资地点的选择有了大得多的灵活性和控制。而且，由于管理和协调此种复合单位的高成本造成了参业壁垒，跨国公司的生产性资产，如专门知识、设计和技术，就能够更紧密地锁定在企业内部。在这种情况下，直接外资的一揽子性质就会造成从贸易到投资的种种收益在分配上高度倾斜的局面，除非本地议价能力能够带来一种较为均衡的结果，就像第一批东亚经济体所做到的那样。但是，在此种投资的流动性极强的地方，仿效这些国家的成功范例要困难得多：本地优势会由于少量的成本变化或替代地点的出现而轻易得到或丧失，带来形成飞地式经济的危险，始终高度依赖于进口投入，如资本货物和半成品。对于在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取得了成功，但现在需要迅速升级和提高生产力以求沿着发展道路取得再进的中等收入国家，这些问题有可能特别严重。

## 竞争与合成谬误

一个国家参与贸易体系包括通过价值链所能得到的益处，除其他外，取决于生产和出口的商品的全球供求关系。供求两方面的不利趋势造成初级商品贸易条件的衰败，长期以来是发展中国家政策制定者的焦虑根源。依靠制成品出口刺激增长被看作是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

由于若干高人口、低收入国家近年来加强了对世界贸易的参与，在跻身于世界贸易的各部门里，就业的劳动力中低技能者多达 70%。可是，这些国家仍有大量的过剩劳动力，而且还有很多大国尚未充分融入国际贸易体系。因此，发展中国家一起同时推动劳力密集型制成品的出口，或相互之间展开竞争，作为用劳力密集型工序替代国际生产网组织的高技术活动的加工地竞相吸引直接外资，可能会重新引发合成谬误的问题，打击外向型经济体的发展愿望，在贸易体系中造成严重的系统化紧张。在高度依赖进口的条件下过量生产标准化大批量产品具有的种种危险，以电子部门最为典型。这个部门的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价格似乎比发达国家之间贸易的同类产品价格更为不稳，在 1995 年之后也比发达国家下跌得更为急剧。

另外一些更一般化的迹象表明，与工业化国家的同类产品相比，发展中国家制成品出口的价格近年来不断弱化。的确，以活跃的制造业部门为基础实现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出口计划的发展中国家，如大韩民国，在其他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出口简单制成品的国家，享有有利的贸易条件。但是，由于一些发展中国家重要制成品的价格似乎也日趋不稳，人们有理由感到担心。因此，制定出口导向政策时，需要考虑到发展中国家劳力密集型制成品出口市场上发生供应过度的可能。

高技能和高技术产品项目的研发含量高，组织生产链的成本也高，形成了重大的进入市场壁垒，因此，在这些产品市场上占统治地位的是北方的卖方垄断厂商，它们开展竞争通常依靠的是质量、设计、营销、品牌和产品特色，而不是价格。某些最终产品技术密集程度虽然较低，但是需要斥以巨额和专项投资，如机械或运输设备，也属于出口市场份额集中率最高的产品之列。

相比之下，劳力密集型产品的市场趋向于有比这强得多的竞争性，尤其是在过去的十年中。这些市场继续为新一代的工业化经济体提供着的机会。但是，先进工业化经济体的疲软增长和高失业率放慢了其夕阳工业的关闭速度。另外，多数中等收入发展中国家由于自己的厂商发现难以升级和多样化，也依旧从事着劳力密集型制成品的生产。发展中国家的劳力市场通过灵活的工资迁就着劳力密集型产品供应量的增加，这种方式进一步加剧了竞争压力，使得企业能够在利润率不受影响的条件下依靠价格进行竞争。在发展中国家，包括国际公司在内的企业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处在不同国家内的劳动力之间的竞争。

随着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实行出口导向的战略，而且其中有些集合了大量的非熟练劳动力，拉丁美洲和东南亚的中等收入国家在这些动态面前似乎最为脆弱。具体而言，电子部门产品的价格竞争不断升级，看来使传统的发展中国家出口厂商日趋严重地面临着崛起于成本更低国家、有更强竞争力的供货厂商的威胁。如果不能迅速升级进入高技能制成品行列，掌握与较先进工业化国家竞争的能力，这些出口国有可能面临来自制成品市场上下两端的挤压。

##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种种影响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引起的问题是，实行多边贸易纪律对中国本身及其贸易伙伴的贸易业绩可能产生的影响。对中国来说，这首先意味着面对更强的外来竞争和商贸存在开放自己的市场。拉丁美洲和转型经济体的自由化经历表明，这可能是对经济政策制定者的一个挑战。但是，中国的一大优势是，它是站在一个实力地位上加入这一多边体系的：出口扩张取得了世人瞩目的成功，有健全和持久的收支平衡地位，有富足的国际储备。而且，中国有充分的力量顶住与消费需求抑制相连的过分进口压力，而使其他一些经济体的自由化努力出轨的正是这种压力。

国有部门的企业和工人将面临最艰巨的挑战。这些企业有些属于农业，但尤为突出的是重工业，包括电力、钢铁、化工和军工，以及服务业。在 1990 年代末，此类企业的就业人口超过 8,000 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 38% 和全国总出口的约二分之一。虽然这个部门进行的改革已经远远超过十年，但其中许多企业的财务状况虚弱，经营状况不能尽如人意，使用的技术过时落伍，并且依赖高水平的保护。加入世贸组织的条件，特别是取消补贴、降低关税和减少非关税措施、以及消除优惠待遇，将对许多这类企业造成沉重压力，而且，它们将要面临的竞争主要来自先进国家的企业，这使局面变得尤为严峻。对于非熟练工人和熟练工人两者，大量下岗似乎都是无法避免的。

脆弱部门整改及增加失业带来的后果，可以通过其他部门的产业扩张加以抵消。预期服装、电器设备、皮革产品和其他轻工业的出口机会在入世之后将会有所改善。直接外资流入量的近期增多表明，低水平的劳动力和基础设施成本仍然具有强大的吸引力。不过，直接外资不大可能带来大量就业。虽然外资企业的出口现在占国内生产总值

的 10% 以上，这些企业雇用的人数还不到全部劳动力的 1%。即使由这些企业占主导地位的各个出口产业将就业翻一番，也不可能指望它们增加吸收多少其他经济部门释放出的劳动力。另外，这些企业严重依赖进口，而进口首先就是一个利润外流的缺口，造成外汇的净流出。虽然全部利润的很大一部分被用于再投资，但外资企业对于收支平衡的这种贡献，与金融危机爆发之前东亚某些国家如马来西亚的情况有某些相似之处。如果直接外资的作用只不过是将其劳力密集型的生产加工转移到中国，这种方针有可能在劳力过剩和高度依赖直接外资的国家之间造成此消彼长和竞争加剧。如果将直接外资用于技术升级，更多地注意国内市场吸收剩余劳动力的作用，就可以避免这种结果。

中国出口厂商日渐壮大的存在使许多具有类似贸易结构的发展中国家感到担心。不过，虽然工资水平低，但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尤其是国有部门，中国在制造业方面对其他发展中国家并没有全面的成本优势。在劳力密集型的制造业方面，包括电子产品的组装加工，中等收入的生产国如东盟成员国和墨西哥，面临的竞争最为激烈，尤其是在三级市场上。这些竞争特别激烈的市场恰恰就是最容易受到合成谬误影响的地方。

之所以强调所担心的问题，是因为中国市场进一步开放带来的贸易机会不大可能有利于中国的潜在出口竞争对手。中国的进口向高技能产品和自然资源倾斜。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和第一批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可能获益最大，因为这加大了与生产网相连的进口零部件或机械的需求量，或者是因为与中国厂商相比它们具有规模可观的成本优势。但是，可以预期，中国农产品进口的自由化不仅会为在中国进口的此类产品中已经占有较高份额的一些亚洲国家带来新的出口机会，而且也会为一些拉丁美洲和非洲国家带来这种机会。

中国面对着进一步融入世界经济的挑战，将需要实行一整套政策理顺调整进程和保持稳固的增长。为了防止经济的某些部门受到严重冲击，中国必须保持对于汇率的自主和在必要时加以利用的选择。由于依靠劳力密集型出口有一定限度，要想迅速而有序地实现制造业的技术升级，便利出口向高增值和技术密集型产品转变，就需要制定一项新的战略，以国内产品替代进口零部件，同时更多地依靠国内市场增加生产性就业。这样一种进程如果把握得当，中国就有能力取得工业化进程的跃进，而不必想方设法通过增加值相对较低的劳力密集型制造业吸收过剩的劳动力。

## 政策问题

发展中国家在贸易体系中面临的基本政策问题，从根本上说并不是一个贸易自由化如何的问题，而是怎样通过参与这一体系以最佳方式萃取促进经济发展的种种养份的问题。对有些国家来说，这仍然是一个脱离对初级商品的依赖的转变问题，但对很多其他国家来说，这是一个提高制成品出口中增值部分的比例的问题。中国所面临的挑战提示我们，即使是最大的发展中经济体，也仍然需要充分的政策空间对融入全球经济的进程实行调控。

自西雅图会议以来，人们对于多边贸易规则会在何种程度上排斥那些曾经是亚洲新兴工业经济体和许多发展中国家成功发展战略构成部分的各种政策方案，表示了关注。假如今天已经实现了当初期待通过乌拉圭回合予以加强的市场准入，这些关注本来是可以减缓的。恰恰相反，市场准入的障碍持续存在，扶持竞争性企业和推动技术升级的政策空间不断压缩，这两者相互交织，加上发展中国

家之间在世界市场上对于劳力密集型产品和(国际生产网的劳力密集型区段的)直接外资竞争过度，再次引起了合成谬误的危险。

在多哈举行的世贸组织第四次部长级会议确认了发展中国家首次在西雅图提出的关注。现在的挑战，是怎样使多边贸易体系变得更有利于发展。结果如何，将以发展中国家在政策选择不受限制的条件下实现市场准入扩大的程度作为评判的尺度。多边贸易体系的活力迫切要求在这方面取得实际进展。

认为在事关发展中国家利益的领域改善市场准入从而落实乌拉圭回合的谈判结果，并不要求工业化国家付出调整代价或此种代价只会很小的看法，是错误的。这些国家长时期的高失业和低增长状况，已经引起社会上很多低技能的阶层反对在贸易上再作让步。但是，重蹈保护主义覆辙并不是前进的道路。解决竞争加剧引起的焦虑，最好的办法就是确保充分利用各种宏观经济和结构政策加快增长和减少失业。这正是发达国家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化解低成本生产国加入竞争行列带来的影响采用的办法，而且，现在没有理由认为，制定一种“双赢”方案超出了当今时代政策制定者的技术能力。

发展中国家也需要保持正确的政策平衡。将需要继续努力将宏观经济和市场的种种压力及鼓励措施恰当地结合起来，确保实行有利于投资的政策制度，以求达到和超过 6% 的增长率指标。但是，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刺激出口—投资的动态关联。发展中国家必须有能力在全部制造产业中升级，确保有更多生成贸易的生产性活动留在国内，并帮助避免与合成谬误相连的各种问题。这将要求通过定标明确的贸易和产业政策以及良好设计的直接外资方针，更快速地扩大国内市场和迅速实现技术升级。东亚新兴工业经济体为此实行的政策是人所共知的。世贸组织的审查进

程将在何种程度上消除技术准入和产业升级的障碍，对于升级，尤其是中等收入国家的升级能否成功至为关键。

最后，许多较大的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找到办法更充分地利用国内的增长资源。这意味着，随着这些国家财富的增加和国内市场的不断扩张，其经济的外向发展势头可能会减弱。对于较小的国家，各种区域安排可能会为刺激贸易和产业力量提供恰当的范围。这类安排曾经为东南亚前后交错的工业化发挥过重要的扶助作用，而现在需要的此种工业化规模较之更广。常规的经济思维往往把这种安排看作是实现发展目标的次优办法，是通往全面开放和一体化多边体系的道路上潜在的绊脚石。但是，当国内企业的技术和生产能力仍然薄弱，当全球经济环境存在着系统化的偏置和不对称时，这种论断的说服力就大打折扣了。

贸发会议秘书长  
鲁本斯·里库佩罗